



民族语文研究 情报资料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



目 录

译 文

论蒙古诸语言中长元音的音位变体·····	【苏】桑席耶夫著 (1)
伊朗的突厥语·····	【土耳其】杰尔哈德·多费尔著 (12)
中古女真语的音韵学研究(下)·····	【南朝鲜】李基文著 (20)
论突厥语和蒙古语里复合动词的构成问题·····	【苏】加尼耶夫著 (41)
朝鲜语音位学·····	【美】塞缪尔·E·马丁著 (46)
蒙古诸语言的“i”的转变·····	【日】服部四朗著 (60)
致服部四朗氏·····	【日】栗林均著 (66)
阿尔泰语言·····	宋正纯、张继忠译 (68)
台湾高山族语言·····	【美】戴安·伊塞多著 (77)
藏语动词的形态变化·····	【美】柯蔚南著 (107)
西夏文字一构成与运用·····	【日】西田龙雄著 (133)
泰语方言学研究·····	【丹麦】易家乐著 (146)
声调的形成与语言的变化·····	【日】西田龙雄著 (183)
现代藏语中的双音节重叠词·····	【苏】科马罗娃著 (193)
西番馆译语之研究—西藏语言学序说选译·····	【日】西田龙雄著 (199)
南亚诸语言的形态结构·····	【英】温尔斯·M·霍尔迈著 (209)

人 物 介 绍

著名的蒙古语言学家罗布桑旺丹·····	道 布 (214)
蒙古书面语·····	【蒙】罗布桑旺丹著 (215)
主要方言和过渡性方言的由来·····	【蒙】罗布桑旺丹著 (216)
日本优秀的汉藏语研究家—西田龙雄博士·····	王云祥编译 (218)

书 目

《国外有关汉藏语言、澳亚语言、南岛语言论著目录》(续)	乐赛月编译 (223)
-----------------------------	-------------

论蒙古诸语言中长元音的音位变体

Г·Д·桑席耶夫 著

陈 伟 译

I. 蒙古诸语言中，长元音按其音长区分为超长元音^①、长元音、短元音和弱化元音（或像通常那样，称之为“不清晰元音”），这些在音位学上都早已阐释清楚了。但是迄今为止，对于蒙古语元音的这种四分法在语流的孤段结构系统方面到底具有何种意义，则尚未进行过研究。

Д. А. 巴夫洛夫及П. И. 比特克耶夫^②，已经成功地对卡尔梅克语元音的音长进行了示波检测。然而，布里亚特语^③的元音则没有经过这种研究，其音长是凭听觉确定的，而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与卡尔梅克语元音经过实验室检测的结果并无不同。我们发现布里亚特语的短元音和弱化元音之间的差别是不大的，与我们在喀尔喀语，特别是在卡尔梅克语中见到的差别相比，几乎等于零。至于超长元音、长元音和短元音，则他们在喀尔喀语、卡尔梅克语和布里亚特语里的音长大致相同。

应该指出的是，在上述三种语言中，开音节的单音节词的结尾元音总是长元音，即便那些历史上原是短元音结尾的也变成长元音。在这方面，第二人称的人称代词的两个词干值得注意（由于所有诸蒙古语的标法都一样，我们在这里只列举喀尔喀语的形式）：чи：（按正字法是 чи，主格形式）“你”，чин- 和 чам-（正字法相同，是相应的属格和其它诸格的词干）；та：（按正字法是 та，主格形式）及 тан-（正字法相同，是各间接格的词干）。在蒙古诸语言中由“та：”构成敬仰谦恭形式（подчеркнуто-вежливая форма）т::нар（按正字法是 та нар，但布里亚特语是 таанар），也就是说这与俄文用大写“Вы”所表示的、并且意义上也大体相当的（即 та：“вы 你们”，та::нар“Вы 您”）那种复数强调形式相仿佛。由这个代词 та：还构成另一个复数强调形式：та：ну：с（在正字法上是连写的 таануус，布里亚特语为 таанад）“你们，你”（用于对多数人讲话表示轻慢时，特别是上级对下级讲话时）。在这些例词中，复数强调形式 та::нар 和 та::ну：с 都是由主格形式 та：所构成（并非由间接格的词干而构成，因为各间接格中的元音[-а-]都是短元音），而长

① Д. А. 巴夫洛夫把它们相应地称之为“长元音”和“半长元音”（参见他的《现代卡尔梅克语语音和书写法》，埃利斯达，1968年）。

② Д. А. 巴夫洛夫，上述著作；П. И. 比特克耶夫著《卡尔梅克语的语音问题》，埃利斯达，1975年。

③ “喀尔喀方言”是指以其为基础形成现代蒙古民族语的那个方言。蒙古学中没有那种类似于“斯拉夫语”和“俄语”或“日耳曼语”和“德语”的表示类属意义和种属意义的两个术语。所以“喀尔喀语”这个术语经常被用来代替表示种属意义的“蒙古语”，而蒙古语这一术语则被用于类属意义。本文里我们使用这个术语正是用之于以现代蒙古正字法所表示的喀尔喀方言现象。至于谈到中国境内的内蒙古诸方言的元音情况，我们目前尚不了解对这些元音所做的示波研究结果。

元音[a:]在接缀上后缀-вар和-ну:с,并出现于非结尾音节的情况下,就变为超长元音④。

因而不能同意巴夫洛夫的见解,他说:“чи‘你’和чи‘樱桃’两词中的元音具有同样的音长(这点正确!——桑)。其实,按其起源来看чи‘樱桃’这个词中的元音[и]是长元音(可见,说它变成短元音就错了——桑)。这如果从他们的间接格形式来考察,情况是明显的:由单词чи‘你’可以构成чини‘你的’(属格形式——桑)。在这里属格形式的原有的[и]的音长基本上仍然毫无变化地保存着(实际上在чи‘你’这个词里“原有的”[и]已变为长元音,而在чини中则作为短元音保存了下来——桑)。由单词чи‘樱桃’可以构成чинини‘樱桃的’(同样,也是属格形式——桑)。在这里元音[и]变成了长元音”(应该说是长元音[и]变成了超长元音,按卡尔梅克语正字法相当于[и]和[ии]——桑)⑤。同时,巴夫洛夫也没有提及这些元音的绝对长度在用西格玛(сигма)来表示时的情况如何。因此,我们现在引用巴夫洛夫的另一些例证材料,根据这些例证材料可以看到,长元音的长度平均为22.6西格玛,例如,在му“不好的”,нуурт“在湖里”和дуи“歌曲”这些词中元音[у:]的音长分别相当于24.6,17.1和19.7西格玛,而то“数量”这个词的元音[о:]的音长则相当于28.8西格玛。超长元音的长度平均为30.5西格玛,例如[у:]在нуурт“在湖里”一词中音长为26.6,在дуунд“在歌曲里”一词中是30.5;元音[о:]在тооси“灰尘”一词中是31.5,在тоо“在数量中”一词中是33.5;而元音[а:]在цааси“纸”这个词中则是30.3西格玛。所以,在音长上长元音与超长元音的比例关系(平均)为1:1.5的样子。

关于第一音节短元音的音长情况(非第一音节中的元音是被视为或解释为弱化元音的,卡尔梅克人在文字上并不把他们标记出来)巴夫洛夫使用下列例词予以说明:тоси“黄油”—14.5,хараи“燕子”—9.6,ах“哥哥”—8.0,хулг“井”—9.0,ботхи“骆驼”—8.0,бичг“信”—7.5西格玛,也就是说平均为9.4西格玛。

非第一音节(闭音节)中的长元音,其音长情况表现如下:长元音[у:]在хакур“镰刀”一词中是11.9,在татур“马肚带”一词中是12.0,在адун“马群”一词中是13.2;长元音[э:]在хорэд“冷却了”一词中是12.4,在чирэд“拖起来了,拉起来了”一词中是13.4西格玛,也就是说平均为12.6西格玛⑥。从上面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出,非第一音节中的长元音却是更接近于短元音(12.6:9.4),而不是单音节词中的长元音(12.6:22.6)。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巴夫洛夫那里看到这样的论点:“……在卡尔梅克语中可以相对地划分为短元音音长区,长元音音长区和中间区三个区段;单音节词中开音节和闭音节的元音及多音节词中非第一音节的开音节元音都属于中间区段。单音节词中这些开音节的元音,以及多音节词中非第一音节的开音节元音在音响上给人以半长元音的印象。这些元音虽然在音响上被读作半长元音,而在音位分类上则作为短元音……半长元音(即长元音——桑)……没有音位意义。”⑦这种异乎寻常的结论可以用下述情况来解释,即卡尔梅克语中在短元音和长元音(按巴夫洛夫的术语是“半长元音”)之间显示出有音位区别的词为数极少,因此正字法上不予标出(唯一的例外是:эм“药”——ээм“锁骨”),——这里指的是单音节词中的现

④ 关于“谦恭形式”参见П.扎格瓦拉尔著《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хүндэтгэлийн Уг, 乌兰巴托, 1976年。

⑤ Д. А. 巴夫洛夫, 前述著作, 第48页。元音[и:]的音长在卡尔梅克语的突厥借词чи“樱桃”中反映出突厥语的双音节:吉尔吉斯语чие或哈萨克语шие“樱桃”。卡尔梅克词汇引用的是突厥语的正字法书写形式。

⑥ Д. А. 巴夫洛夫, 前述著作第44—51页。

⑦ 同上书, 第45页。

象。当然，这里也谈到了处于一定位置上的第一音节短元音的音长和最后一个音节中或单音节词中的长元音的音长似乎在逐渐接近起来。依据上下文在这里也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元音之间在音长上的差别似乎退居到次要地位（心理学上的支配现象！），例如，*дулан зун*“热烘烘的夏天”——*зун*（按正字法是替代 *зуун* 的写法）*кило*“100公斤”。试比较俄语中省略了重音符号的两句话：*ключ входит в замок*（“钥匙插进锁里”或“钥匙插进城堡里”）和 *гость входит в замок*（“客人走进城堡”或“客人走进锁里”）。

这类见解和正字法规则（据此在卡尔梅克语中短元音就只标记于第一个词，而长元音仅在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出现时，才用二个相同字母的连写来表示，在非第一音节时，则用一个字母的单写表示）无论在喀尔喀语和布里亚特语的理论书籍中或实际应用的参考材料中都是没有的。这是因为在喀尔喀语和布里亚特语中具有比卡尔梅克语数量大得多的、依据长元音和短元音的音位对立以区别语义的成对词汇，例如：喀尔喀语的 *аг*“强烈地，坚固地”——*ааг*“刀刃的根部”，*дэл*“票”——*дээл*“皮大衣，长袍”；*сал*“突然涌出地”——*саал*“障碍物”；*сам*“梳子”——*саам*“借口，口实”；*ур*“肿胀，树上的木瘤”——*уур*“蒸气”；布里亚特语的 *хэр*“怎么，如何”——*хээр*“枣红的（指马）”；*бал*“蜜”——*баал*“长条干草堆”（来自俄语的 *вал*“长条草堆”）。其实，卡尔梅克语里也有不少这种成对的词汇^⑥。

无论蒙古学中对语音的研究情况如何，但是我们还是注意到在卡尔梅克语中有关元音的音长问题现在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断论。例如长元音（“半长元音”）和短元音，比特克耶夫就解释为音长相同的短音，即语音上是一样的；而且在蒙古学中称之为长元音（巴夫洛夫的术语是“半长元音”）的那些“短元音”则被确定为“清晰的”元音，也就是“来源于历史上的长元音和复合元音”^⑦。遗憾的是，比特克耶夫的这些检测示波资料极其杂乱无章，因此不能为做出明确而准确的结论提供可靠的依据。例如，长元音[a:]（比特克耶夫称作“清晰的”元音）的音长，不同的发音合作人发出的音就不一样，譬如说 *утан*“烟”这个词（转换为西格玛则分别是）：20.2, 15.5和7.6^⑧。

在现代卡尔梅克标准语里，单音节的和多音节词非第一音节的长元音，如上所述，是单用一个元音字母表示的，同第一音节中的短元音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就导致大量同形词的出现，例如：*таг*“隔板”——*таг* (та:г) “让（他）猜猜”；*тег*“好吧！”——*тег* (те:г) “原野”；*сер*“静的（关于风）”——*сер* (се:р) “颈椎骨”；*бог*“灰尘、垃圾”——*бог* (бо:г) “脊背的肩胛骨部分”等这样一些词。当然，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只能在上下文中才能懂得这类同形词的不同词汇意义，那么在活的语言中的情况又怎样呢？首先，正如上文所述那样，长元音和短元音之间的差别尽管不大，但毕竟还是存在，所以只要在活的语言中找不到音响上的同音词，那么，仅此一点也就足以说明问题。其次，这里应该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语音顺序情况，这一情况迄今尚未引起蒙古学家们应有的注意。这就是：长元音听起来使人感到比超长元音更明晰、更清楚，尤其在既有超长元音又有长元音的词中听起来更是如此，例如，卡尔梅克语 *баатарган* (ба::тарга:н) “对自己的英雄”。这个词中的超长元音[a::]在离讲话人某一距离的情况下，听起来还没有长元音[a:]清晰，这同我们在埃利斯塔各种不同年龄的卡尔梅克人中进行试验的结果一样。在埃利斯塔，当地

⑥ II, II, 比特克耶夫，上述著作，第66—68及80页。

⑦ 同上书，第65—81页。

⑧ 同上书，第82页。为了使我们所引用的II, II, 比特克耶夫的材料与Л. А. 巴夫洛夫的材料相一致，我们把它们全都转换为西格玛。

的俄罗斯人在隔着一段距离的情况下读形容词прекрасное(“美好的”)这个词而故意拖长第一音节的元音[e],被试人员很清楚地听到的却是带重音的[a],而不是“拖长了的”[e]。

蒙古语语音学家之所以没有考虑这一情况,是因为他们在研究蒙古语元音系统的音长特征时只从音位作用这一角度,而没有从音调的提高方面去进行研究^①。其实,蒙古诸语言中的长元音在发音时不可能没有声调的提高,然而超长元音和短元音却相反地在发音时不可能有声调的提高。但是远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音调的提高在蒙古语元音系统中是主要的音位特征。这种结论似乎只有在蒙古语元音系统中,一方面超长元音和长元音之间,另一方面超长元音和短元音之间的音位差别假定说已完全消失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就象例如哈萨克语中形成的жак“面颊”和жақ“方面,边缘”(试比较吉尔吉斯语жаак“腰”和жак“方面”)这类同形词的情况一样,这是一。第二,还“需要”在蒙古语词汇中一个单词只可以有一个长元音,就象一个俄语单词里只可以有一个元音是重读音音那样。大家都知道,在蒙古语的一个词中可以有二个或三个长元音音位,如布里亚特语таараараа(та:ра:ра:))“用自己的长条粗布口袋”,等等。

这里所说的问题的实质就在于超长元音和长元音乃是同一个音位的音位变体,这与同一个短元音音位的短音音位变体和弱化音位变体相并立的情况是一样的。由此不难发现,读长元音时提高声调乃是因其所处的位置决定的,而并非为了与超长元音相区别而由音位效能造成的。有趣的是非蒙古人在听觉上并不能分辨短元音和发音上不提高声调的超长元音之间的差别,这是因为他们在任何一个蒙古语单词中都在“寻求”声调提高的元音,把булаг听成булак“泉、源泉”,把алтаң听成алтaн“金子”,等等。

超长元音的音长大约是30西格玛,在音响上像是俄语中特别拉长声调的重读音音似的,例如,在疑问句中,Лоошаль(原词是лошадь“马”——译者)? Разве(“难道是”)она(“她”)таам(原词是там“在那里”——译者)?长元音因出现在词中的位置不同,其音长也不一样,由21西格玛到10西格玛,在听觉上这个长元音和俄语там, дом, дума这类词中的重读音音相似。至于谈到短元音,则在音响上给人的印象与俄语лебо(рoб),коло(кoльня),ре(кa),ал(мáз),иг(рá)这类词中重读音节前的非重读音音类似,其音长由9西格玛到15西格玛。而单音节词中的短元音,则比特克耶夫将它们实际上解释成单音节词的和多音节词里非第一音节的长元音,并统称之为“清晰”元音,但遗憾的是这并未取得示波资料的证实。同时,比特克耶夫还断言:“单音节词中的元音虽然在起源上或来自长元音,或来自短元音,……但在现代的发音中,它们都是同样地作为短元音理解的”^②。然后就列举了一份像чиг“方向”——чиг(чиг:г)“潮湿”(相当于喀尔喀语

^① 诚然,蒙古学家们曾简略地谈过蒙古语的元音不仅在音长方面互有区别,而且在松紧度方面也是不同的;参见И. Д. 布拉耶夫著《布里亚特语的语音结构》,乌兰乌德,1959年,第124—127页;П. Д. 比特克耶夫的前述著作,第151页;Л. А. 巴夫洛夫的前述著作,第55页(关于辅音)。但是在蒙古语实验语音学中还没取得像С. 库列诺夫研究土库曼语元音系统(《土库曼语中的长元音和短元音》,阿什哈巴德,1971年(用土库曼文发表))的名著中所取得的那种成就。顺便说一下,根据这位学者的著作可以明确,或者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正如所预料(众所周知,在突厥诸语言中重音落在最后一个音节,而蒙古诸语言中的重音则落在第一音节),土库曼语中单音节词的长元音比多音节词音节中同一元音要长一些(а:т“名字”,但 а:тлм“有名望的”),然而蒙古诸语言中的情况则恰恰相反(де:л“皮大衣”,但 де:ле:р“用皮大衣”)。

^② П. Д. 比特克耶夫,同上著作,第65页。

的чиг—чийг)这类词的词汇表。无疑,这些语音现象应当成为语音心理学研究的对象。问题在于这样就产生了可以说是上下文的语义方面超过实际语音方面,并从面超过音位方面的现象。也有可能是现代卡尔梅克标准语的正字法对比特克耶夫的发音实验人,即年青一代人的发音上的影响在这里起了作用(这样的论断从布里亚特学家和喀尔喀学家那里是不会听到的)。此外,正如上述,这也说明对卡尔梅克语的元音系统进行的实验语音学研究是不完备的,也就是缺少读元音时声调提高程度不同的具体材料。

不从音位上对短元音和长元音(按巴夫洛夫的术语是“半长元音”,而按比特克耶夫的术语则是“清晰元音”)之间的差别进行区分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语音的绝对音长毕竟是不同的;尽管它们之间的界限有时很模糊,但却并没完全消失。但最主要的是单音节词的或多音节词收尾音节中的长元音由于在词形变化或构词的过程中出现于多音节词的非最末音节,因而都变为超长元音。现行的卡尔梅克文正字法中已对这一现象做了规定,并在正字法辞典中以星号标记出来,例如:лун* (读作лу:н)“歌曲”,但луунд (лу::нд)“在歌曲中”;то* (то:)“数目”,但тоонд (то::нд)“在数目中”;нур* (ну:р)“湖”,但нуурт (ну::рт)“在湖中”;хон* (хө:н)“绵羊”,但хөөч (хө::ч)“牧羊人”,等等。

短元音没有经历这种“延长”的过程,这也即是短元音与长元音本质区别的所在。

现在就来简单谈一下弱化(所谓的“不清晰的”)元音(卡尔梅克语тодорха биш,喀尔喀语балархай)的音长问题。弱化元音的音值完全取决于前面音节中非弱化元音的音值。按照П. И. 比特克耶夫的材料得出的结论是,在多音节词的最后一个音节是闭音节的情况下“不清晰”元音的音长平均为5.2—5.3西格玛,在开音节的情况下为9.8—10.4西格玛,而在多音节词的词中则是6.0西格玛(1.4到10.5)^⑧。弱化元音在音长方面的这些差别不难从发音风格的不同上得到解释:第一,发音时从来没有长元音所固有的那种声调的提高;第二,发音时这些元音可能并不比第一音节的短元音还短。例如,喀尔喀语正字法上写作хар“黑的”,可以读成хар(尾音割弃←хара!)的样子(收尾的[а]的音长可以表现为1.4到10.5西格玛),而绝不影响该词的意义。在卡尔梅克语和喀尔喀语中,如果收尾元音紧续在塞辅音后时,也可以见到这种情况(在布里亚特语中则极少见),例如,喀尔喀语бат(尾音割弃←бата←бату)和бата“坚固的”;бид(←биде)和биде“我们”;хуц(хуца←хуча)和хуца“牡绵羊”,等等。但是,上述情况并不是说在发音时最后一个音节的辅音带或不带收尾元音对于蒙古诸语言都完全无关紧要。在喀尔喀语的гар“手”,гал“火”,өм“药”,хэрэг“事情”这类词中就不可能出现收尾元音的尾音增生(парагогические наращения)。当然,在快速的对话情况下尾音割弃的现象几乎是屡见不鲜的。巴夫洛夫的结论与比特克耶夫的材料基本上没有分歧:“处于词末的弱化元音(在卡尔梅克语中——桑)听起来比较容易使人感到像是一种含糊的不清晰音,虽然不处于词末的弱化元音则几乎单凭肉耳是感觉不到的。”^⑨所以,巴夫洛夫用硬音符号[ъ]来表示这种音。但是,正如上述,因为弱化元音的音值取决于其前的非弱化元音的音值,所以比特克耶夫在自己的记音中使用不同的符号“ä”、“a”和“i”来表示这些元音的音值上的差别是正确的。但绝不能同意比特克耶夫所写的下述意见:“卡尔梅克语的非清晰元音是独立的音位,以其微弱的紧喉而与短元音和长元音相对立。”^⑩第一,我们的作者并未举出一

⑧ 这些数字我们是根据П. И. 比特克耶夫的材料推算出的(参见同上著作,第127—137页)。

⑨ П. И. 巴夫洛夫,同上著作,第55页。

⑩ П. И. 比特克耶夫,同上著作,第126页。

个例子用以证明这一论点。第二，这三种不同的弱化元音从来也不会处在同一语音位置上，实际上比特克耶夫本人对这些语音就正是这样描述的。第三，如果说弱化元音是“独立的音位”的话，那么在卡尔梅克语中就总可以找到那怕一个词，其元音都是由单一的弱化元音所组成；当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与俄语相似，例如在俄语词汇中就没有一个词仅仅是由一个或数个非重读元音组成的）。

在卡尔梅克和喀尔喀标准语中弱化元音是不标出来的，而如果在喀尔喀语中把弱化元音标记出来了，那也是遵循着严格规定的准则做的，并且这些准则在所有的蒙古学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因此在卡尔梅克的报刊中经常出现带有若干辅音字母的单词，例如，*коллишчирт*（完整的发音即*коделмерчирте*）“给工人们”。在布里亚特语中这些元音基本上是全都被标记出来的。例词：卡尔梅克语 *тергяд*，喀尔喀语 *тэргэндэ*，布里亚特语 *тэргэндэ* “乘大车”；卡尔梅克语 *кэргэ*，布里亚特语及喀尔喀语 *хэрэг* “事业”；卡尔梅克语 *аларт*，喀尔喀语 *аларт*，布里亚特语 *аларта* “光荣的，著名的”；卡尔梅克语及喀尔喀语 *ара*，布里亚特语 “在……后面”；卡尔梅克语 *аршэрт*，喀尔喀语 *арэгарт*，布里亚特语 *арзагарт* “向不平滑的”。

至于谈到在正字法上表达非弱化元音的方法，可做如下说明：1) 短元音用一个单写的元音字母表示（例词见上文）；2) 长元音在布里亚特和喀尔喀语中用重叠的元音字母表示，而在卡尔梅克语中则用单元音字母表示：喀尔喀语 *дуу*，布里亚特语 *дуун*，卡尔梅克语 *лун* “歌曲”；喀尔喀语和布里亚特语 *дулаан*，卡尔梅克语 *дулап* “温暖”；3) 超长元音用重叠的方法表示：卡尔梅克语 *лаарх*，喀尔喀语 *лаарах*，布里亚特语 *лаараха* “觉得冷，发冷”；卡尔梅克语 *гөөх*，喀尔喀语 *гээх*，布里亚特语 *гээхэ* “丢失”。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则在音位学上可以表述如下：布里亚特语和喀尔喀语中的长元音音位在所有的音节中都用重叠书写元音字母的方式表示，而卡尔梅克语则仅第一音节中如此，非第一音节仍用单写字母表示。

Ⅱ. 所以，在蒙古诸语言中元音按其音长可分为：1) 超长元音，2) 长元音，3) 短元音及 4) 弱化元音或“不清晰元音”。第一类和第二类元音是长元音音位的变体，而第三类和第四类则是短元音音位的变体。蒙古诸语言中长元音和短元音的音位性质（фонемотичность）是众所周知的，这里仅从布里亚特语中举几个例词即可（由于正字法的原因，这里就不列举喀尔喀和卡尔梅克语的例词了，因为在这些语言里非第一音节的短元音在书写时并不标记出来）：*дара* “压” — *даара* “觉得冷”；*дэрэ* “床头” — *дээрэ* “在上面，在……之上”；*ула* “脚掌” — *улаа* “大车” — *уула* “山”；*гоно* “抢劫” — *гооно* “杂草，麦仙翁”；*харин* “但是” — *хариин* “外部落的，异乡的”，等等。而从音位学观点来看，蒙古语中的元音只要分成上述的两组也就足够了。但是，对这些元音的四段式区分却有其重要的节段意义或曰音义段意义（сегментно-синтагм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问题在于蒙古诸语言中的超长元音、长元音、短元音和弱化元音是严格地由其在词中的位置而决定的，这在词汇一形态学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超长元音只可能出现在多音节词的非收尾音节，例如：卡尔梅克语 *ду::на*，布里亚特语 *ду::нэ*，喀尔喀语 *ду::нэ*（相当于 *дууна*，*дуунай* 和 *дууны*，这里以及下面括号里列举的例词都是该词的正字法形式）“歌曲的”（属格）；卡尔梅克语 *дөрә::тэй*，布里亚特语 *дурө::тө*，喀尔喀语 *дөрө::тө*（*дөрөтэ*，*дурөөгэй*，*дөрөөгэй*）“有马镫的”；卡尔梅克语 *темә::ндэ*，布里亚特和喀尔喀语 *теме::нде*（*темэндэн*，*тэмээндээ*）

“给自己的骆驼”。

长元音只可能出于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的尾音节，例如：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和喀尔喀语 ху:р (卡尔梅克语 хур, 布里亚特语和喀尔喀语 хуур) “胡琴”；卡尔梅克语 кә:р, 喀尔喀语 хә:р, 布里亚特语 хә:р 和 хә:р (кә:р, хә:р, хә:р 和 хә:р “枣红马”；卡尔梅克语 дола:н, 喀尔喀语 доло:т, 布里亚特语 доло:н (долан, долоо, долоон) “七”。上面已经提到过，处于非收尾音节的长元音在词的形态变化过程中变为超长元音。

短元音，有时也称作“正常”元音，只出现在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和单音节词中，并且在任何语音条件和形态学条件下都不会变成长元音，更不用说超长元音了，例如：卡尔梅克语 дуран, 喀尔喀和布里亚特语 дура (дуря, дур, дура) “意愿，愿望，喜爱”；卡尔梅克语, 喀尔喀语 чоно, 布里亚特语 шоно (чон, чоно, шоно) “狼”；卡尔梅克语 ер, 喀尔喀语 ср-ере, 布里亚特语 ере (эр, эр, эрэ) “男人”；卡尔梅克语、喀尔喀语、布里亚特语 ем (эм) “药”。但是，当完整地或故意拖长声音发音时，短元音也可以出现在非第一音节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弱化元音也都变成短元音。^⑧

还要简单地谈一下喀尔喀语及布里亚特语里的二合元音问题（在卡尔梅克语中所有的二合元音都已变成长的单元音），这些二合元音在发音的长长度方面与长元音音位相类似，并成为超长元音的和长元音的音位变体，其中后者还有变为长的单元音的趋势。而且这种长的单元音还保持着二合元音的形态特性——有这种收尾长元音的静词在属格形式时衔接的是后缀变体-н, 例如，喀尔喀语中由 шоро: <—шорое: <—*шорои “尘土”构成的 шоро:н, 虽然带原有的收尾长元音的静词衔接的是属格的后缀变体-ги:н, 例如，由 жоро: 构成的 жоро::ги:н “走马的”。（在卡尔梅克语中，由于所有的二合元音都已变成长的单元音，属格的后缀变体-н 衔接在具有收尾长元音的多音节词之后，但带有收尾长元音的单音节词衔接的是后缀变体-Эн:н, 例如，由 ноха: <—нохал “狗”构成 ноха:н, 但由 ца: <—цал “茶”构成的则是 ца::Эн:н, 试比较与之相对应的喀尔喀语的 нохоел и цаел。卡尔梅克语中属格的后缀变体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转位”，则是因为在该语言中带有收尾二合元音的多音节词从前远比带有收尾长元音的词多得多的缘故）。

根据以上所述不难看出，对超长的二合元音的研究应当与超长元音同样看待，面长的二合元音和来源于二合元音的长单元音则应当与长元音看作是同义的，因为出现于非收尾音节的长二合元音变成了超长元音，例如，喀尔喀语 шоро: <—шорое: “尘土”，然而 шоро::ги (客体格)。^⑨

⑧ 因为在非收尾音节“正常”音长的元音音位一般都弱化，因此标音上无需标出弱化符号或超短化符号。

⑨ 使用听觉方法确定的这些二合元音在所有的蒙古学文献（这里仅指出一些近期的著作）中都有记述。参见，例如，Ш. 罗布桑旺丹著 Орчин цагийн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зүй авчаны бүтэц [《现代蒙古语语音结构》] 乌兰巴托，1967年。喀尔喀语和布里亚特语的二合元音是不久前使用实验室的方法研究确定的，参见：С. урсгийн Моомоо, 《现代蒙古语的音位体系》，调查资料，列宁格勒，1970年；Ж. 朗鲁著 “Баруун халхын аман аялгуу [《西部喀尔喀语》]”，Халхын аялгуу [《喀尔喀方言》]，乌兰巴托，1970年，第135—221页；И. Д. 布拉耶夫，Т. П. 巴日耶娃，Е. С. 巴夫洛娃著《布里亚特语的语音图解》，乌兰乌德，1975年。很遗憾，在这些著作中没有有关元音音长的准确材料。

我们刚刚收到蒙古学者朗鲁的一部重要著作 Орчин цагийн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авч зүй [《现代蒙古语的语音学》]，乌兰巴托，1976年，此书的基本结论与卡尔梅克语语音学家的结论相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蒙古诸语言音义段系统中存在的下列现象：

1. 在单音节词中不能有超长元音和弱化元音，正如同多音节词里的元音不能由单一的超长元音、单一的长元音或单一的弱化元音所组成那样。

2. 在两个词相毗连的音节中，即在前一个词的末一音节和后一个词的首音节，绝不出现两个超长元音或两个弱化元音的接续。

3. 当前一个词是单音节词时，在这种相毗连的音节中可以有二个短元音，例如：喀尔喀语 мал usaha “饮牲口”，布里亚特语 гол зорилго “基本任务”，卡尔梅克语 гер хаща “建筑物”（直译是“蒙古包和院子”）。

4. 当第二个词是单音节词，而前一个词是单音节词或虽是多音节词但以长元音收尾时，则在这种相毗连的音节中可以有二个长元音，例如：卡尔梅克语 мана : те : г (мана тег) “我们的草原”，喀尔喀语 хи : бу : (хий буу 与动词 тавих 构成的组合“白忙一阵”)，布里亚特语 жоро : хе : р (жороо хээр) “枣红色的走马”，мала : ту (малаа ту) “赶自己的牲口吧”。

因此，在蒙古诸语言中确定词与词之间的界限从语音上是没有任何困难的。这在词汇的或形态学的“结合”方面也是可以办到的，然而现代蒙古诸语言的正字法反映出来的却并不完全一致。

例如，在这些语言中早就有 лу : гар- “说，发出声音，说起话来，响起（指声音）”这个词组。有时把这个词组的组成成分合写成 луугар-^⑨ 的样子，有时则又分写成 луу гар- 的形式。^⑩ 从语音观点来看，对这一词组的组成成分分写是正确的，因为在这些组成成分的语音完全结合的情况下，第一个组成成分 луу 的元音似乎应成为超长元音 [у:]。试比较喀尔喀语的 Лувсандэлдэв, Дамдинсүрэн 和 Гармажав（相当于 Лувсан-Дэлдэв, Дамдин-Сүрэн 和 Гарма-Жав）这类合成专有名词，然而这些词都是合写的。在此类合成名词的第二个组成成分的第一音节中，元音（这里相当于 [э], [у] 和 [а]）是“正常”元音，即短元音，而不是弱化元音，因此也就证明这些组成成分都是语音上独立的词汇单位。

在喀尔喀语中也是把人称物主小品词与相应的名词（特别是尾音节有长元音的名词）分写，这较之布里亚特语或卡尔梅克语的书写法更能显示出语音的实际情况，例如：

喀尔喀语	布里亚特语	卡尔梅克语
зээ минь	зээмин	зэм “我的外孙”
зээ чинь	зээшин	зэчн “你的外孙”
зээ нь	зээнь	зэнь “他的，他们的外孙”
зээ маань	зээмнай	земн “我们的外孙”
зээ тань	зээтнай	зэтн “你们的外孙”

在这些例词中元音 [e:]（按正字法写作 ээ 和 е）没有变为超长元音 [e:]，所以，从语音角度看，喀尔喀语把人称物主小品词都分开写较之布里亚特语及卡尔梅克语里的写法更为正确。应该指出，在布里亚特语和卡尔梅克语中这个词里的长元音 [e:] 并没有变成超长元音，

^⑨ K. 达尔赫札布, И. 策伦奇梅德著 “Зед бичиг зүйн толь бичиг” [《正字法辞典》], 乌兰巴托, 1974年, 第119页; И. Б. 策真丹巴耶夫编《俄语——布里亚特语辞典》, 莫斯科, 1954年, 第105页。

^⑩ 《蒙—俄辞典》, А. 罗布桑丹德布主编, 莫斯科, 1957年, 第160页; И. 达姆丁苏伦, А. 罗布桑丹德布编《俄蒙辞典》, 乌兰巴托, 1967年, 第305页。

虽然所列举的小品词在音向上好像与这个词已合为一体似的。蒙古诸语言正字法中的这类不一致并非是个别的，试比较喀尔喀语 *аж байдал* “生活，生活方式”，*аж ахуй* “经济”，*аж уйлдвэр* “工业”等，这些词在语音上虽然与布里亚特语相同，但在正字法上却有区别：布里亚特语写作 *ажабайдал*，*ажахы*，*ажауйлдвэр*。蒙古诸语言中词组的合写法与俄语中 *хлебозаготовка*，*паровоз* 等这类复合词的合写法毫无共同之处（有时在布里亚特文字中也会遇到仿造俄语的写法，如把 *тариа бэлэдхэл “хлебозаготовка”* 写成 *тариа-бэлэдлэл*，尽管根据正字法规范这种写法是不允许的）。

在布里亚特语和喀尔喀语中有这样两个词，它们虽然起源于同一个词——共同蒙古语的 *угеи* 一词，但实际上却是两个词：喀尔喀语和布里亚特语 *гүй* “无，没有的”以及喀尔喀语 *угуй*，布里亚特语 *угы* “没有，缺乏”。其中第一个词已经可以看作小品词，书写时与前面的词合写：喀尔喀语 *ажилгүй*，布里亚特语 *ажалгүй* “失业的，没有工作的”，喀尔喀语和布里亚特语 *ухаангүй* (*уха : н гүй*) “没有理智的”。第二个词则与前面的词分写：喀尔喀语 *ажил угуй*，布里亚特语 *ажал угы* “工作没有”（这也可以表示“没有失业的（人）”）；喀尔喀语 *ухаан угуй*，布里亚特语 *ухаан угы* “没有理智”（这里也还是 *уха : н*，换言之，在有 *-гүй* 的情况下长元音 [a:] 未变成超长元音 [a::]）。还有一个例词：喀尔喀语 *жороо угуй*（在这里是“没有走马”）和 *жороогуй* “没有走马的”。这里长元音 [o:] 没有变成超长元音，在第一种情况下所指的是“根本就不存在走马”。

总而言之，如果词组组成成分在语音上可以部分地结合起来，而这些组成成分的词汇起源又是完全可以察觉得到的，那么处于非收尾音节的长元音，无论其后续音节中的元音受到什么样的语音变化的影响，都不变成超长元音。换言之，只有位于词形变化词缀和构词词缀前面的情况下长元音才变成超长元音。正因为如此，所以疑问小品词和情态小品词前面的长元音不变为超长元音，因为这些小品词不是词的不可分离的词素（或词的一部分），而无论它们与后面的词连续得是如何地紧密（卡尔梅克语中这些小品词与后面的词的合写以及布里亚特语和蒙古语中的分写都是由此产生的）。试比较卡尔梅克语 *хаша : j—и?*，布里亚特语 *хаша : гу?*，喀尔喀语 *хаша : у?*（正字法上相应的分别是 *хашай*，*хашаа гу*，*хашаауу?*）“难道这不是院子吗？”；卡尔梅克语 *хаша : л*，布里亚特语 *хаша : ла*，喀尔喀语 *хаша : л* (*хашал*，*хашаал* ~ *хашаа лэ*，*хашаа л*) “（这就是）院子”。但是如果说，例如，人称物主小品词显然是众所周知地起源于人称代词的属格形式（因此带有这些小品词的静词的收尾长元音不变为超长元音，参见上文 *зээ минь* 等例词），那么却完全说不出无人称物主小品词（或反身物主小品词）*-а :* (*-е :*，*-о :*，*-ө :*) 或复数词缀 *-нар* (*-нер*，*-нор*，*-нөр*) 是什么起源，因此在相应的静词中，处于这些词素前的长元音变成超长元音。例如（括号里是正字法形式）：

卡尔梅克语	布里亚特语	
зе : (зе)	зе : (зээ)	“外孙”。
зе:: Бә:н (зееһән)	зе::ге: (зээгээ)	“自己外孙的”
зе::нер (зеенр)	зе::нер (зээнэр)	“外孙们”
то: (то)	то: (тоо)	“数”
то:: Ба:н (тооһан)	то::го: (тоогоо)	“（把）自己的数”

但是喀尔喀语的 *нар* 被认为是构成复数的“后置词”，书写时分写，而在人名的后面则具有“及其他，等”的意义，例如：*лам нар* “喇嘛们”；*Баяр*，*Галсан нар* “巴雅尔、

嘎拉桑及其他人等”。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该“后置词”前面的收尾音节的长元音也变成超长元音，例如，Дулма：(Дулмаа)，女人的名字 Дулма，但 Дулма：нар (Дулмаа нар) “杜尔玛及其他人等”。可见，只有在这个词素适用于书面语时，才可以把它看成是“后置词”。

无疑，在日常对话的语流中所有的词似乎全都是连续的，当然，如故意放慢说话速度，自应另当别论。而如果用准确的音标来记写这种对话（或者，例如讲演者发表的公开演说）或是判读这种对话的磁带录音，那么就可以辨别出一个词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词素（词缀）之间的界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可以辨别出那些并非是词的组成部分的小品词（或者说并非是过去组成人-称谓语小品词而又来源于人称代词并有时称之为“谓性附加成分”的那种小品词）之间的界限。下面就举例来说明所述超长元音和长元音必须予以区别的意义何在（括号内是正字法形式）：1）喀尔喀语 хара：сан (хара сан)，布里亚特语 хара：хан (хараа хан) “看见了”，在这里 хара：是来自动词词干 хара-“看见”的现在时形动词，而 сан 和 хан 是来自助动词*а-“是，有”的失去作用的词干的过去时形动词，这个形动词保留在源于*агсан (-гсан，该形动词的词缀)的截断形式内；2）喀尔喀语 хара：：сан (хараасан)，布里亚特语 хара：：хан (хараахан) “骂了的”，这里是来自动词词干 хара-“骂”的过去时形动词；3）布里亚特语 хата：-ха (хатаа ха) “看来是（大概是）干枯了”，хата：是来自 хата-“干涸”的完成行为现在时形动词，ха 是现在一将来时形动词（来自上述失去作用的词干*а-）←аха←аку。有意思的是，在布里亚特语助动词 хан 和 аха 中只留下了形动词词缀，而动词词干本身则已脱落（就好像在俄语 был 和 быть 一词中就只留下了 л 和 ть 一样！）；4）хата：：ха (хатааха “有晒干…”的) 是来自 хата：-“晒干”的同一词的形动词形式；5）布里亚特方言的 жоро：ји (жороо гу)？“不是走马吗？”；6）жоро：：ји (жороое) “把走马”（客体格）；7）布里亚特语 хара：да： (хараа даа) “无可争辩地，看见了”，这里是来自 хара-“看见”的完成行为现在时形动词并带有肯定小品词 да： “不是吗，无可争辩地”；8）хара：：да： (хараадаа) “予见了”，这里是来自 хара：：да-“予见”的同一词的形动词形式。

如果在这些例词的标上不区别出超长元音和长元音，那么就弄不明白上述单数的例词和双数的例词在意义上有什么不同（就如同在俄语中不在 мука “面粉”和 му́ка “痛苦”或 замо́к “锁”和 замо́к “城堡”上标上重音一样）。

但是，交谈者在这类情况下并不是根据元音的音长听出超长元音和长元音间的区别（因为在长元音的这些音位变体中音长总是有差别的），而是根据（长元音的）有和（超长元音的）无明显的声调提高听出不同。但是，不能由此就一反通行的观点看法，得出结论说：蒙古语元音系统中元音的长短在音位上乃是附带的特征，而声调的提高（重读或非重读）才是本质上的特征。当作为长音位的音位变体时，超长元音和长元音从不出现在同一个语音位置（关于这点以及根据这些音位变体辨别词与词之间的界限，上面已谈过）。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即，如果超长元音和长元音也与短元音一样都曾是独立的音位，元音的三个长度级又曾有过音位意义，那么我们在蒙古诸语言中就有可能找到这样的三类词，它们正是按照音位特征而在词义上彼此互相区别。例如，有 ула “脚掌”和 ула： “大车”（正字法上分别相应为 ула 和 улаа）二词，但喀尔喀语和布里亚特语里却没有（也不可能）有带超长元音[а：]的而形式为 ула：的第三个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末在书写上大概就只有用 улааа（超长元音[а：]的三联书写）的形式来表示。同样地，喀尔喀语中有 сур “皮条，皮带”和 сурр

(суур) “鹿角的根部”二词，但却没有带超长元音[y:]的第三个词，即某个су:р一词。

在音位上蒙古语元音的音长只是表面上与元音的重读，例如俄语的元音重读相同，尽管在蒙古语借用的俄罗斯词语中还把俄语的重读元音表示作长元音或超长元音：喀尔喀语 ба:а за《база“基础”》，布里亚特语 боломо:мо《солёма“禾稻”》，то:м《том“卷，册”》（正字法上分别是 бааза, боломо, том；但最新借用的俄罗斯词语仍保持着俄语本身的正字法形式）。下面以蒙古语同相应俄语例证的对照比较来进一步说明：第一，如果在蒙古诸语言中存在着以其元音的音长面互相区别的成对的单音节的词，例如喀尔喀的 бог “垃圾，灰尘”和 бо:г “让他包上吧”，那么在俄语里则没有任何这样成对的单音节词（或同音形态词）——其中一个词带重读元音，而在另一个词里则是非重读元音，例如，只有单词 дом，而没有另一个带非重读元音[-о-]的 дом^⑤。因为俄语的单音节词中不可能有非重读的元音，正如同在蒙古语的单音节词中既不可能有超长元音，也不可能弱化元音一样（俄语中带有非重读元音的“变体”是可能的，如 так как ты сказал? “是因为你说了？”与 так, как ты сказал “就像你说的那样”这类非重读元音变体）。第二，俄语中不可能有这样的多音节词，其中一个以上的重读元音都具有词汇-语义意义（在这里长词，大部分是合成词，的次重读元音以及诗歌韵律中的现象除外）。同时，在蒙古语多音节词中元音音位可以全部是长元音，也可以全部是短元音，或两者都有，例如，布里亚特语 дэре “枕头”，дэре: “自己的枕头”，дэ:ре “在上面”，дэ::ре: “在自己的上面”，гаргаба “拿出了”，喀尔喀语 а:ру:л “奶渣”（专门制作的），а:ру::ла:р “用奶渣”，а:ру::ла:ра: “用自己的奶渣”，бо:цо: “赌注”，бо:цо::го:р “用赌注”，бо:цо::го:ро: “用自己的赌注”（正字法上相应分别为 дэре, дэрэ, дээрэ, ааруул, ааруулаар, ааруулаараа, бооцоо, бооцоогоор, бооцоогоороо）。第三，在蒙古语的词中元音的音长无论是在词的变化形式，还是在构词的情况下都是不移动的和固定的（只有长音位的长元音变体才在该位置上变为超长元音），然而俄语中的重读元音则不然，它们在词形变化和构词过程中却是有变动的：дома, дома́, домово́й, горы, горы́, горноу́дний, горно-лесе́стный。

所以，在确定蒙古诸语言中某些词缀和小词（它们在语流中是与词干连续在一起的）在书写上的连写和分写规则时，只可以遵循语音特征，而不能象俄语中那样依据意义来确定（неплохо́й “不坏的”和 не плохо́й “不是坏的”——而是 хоро́ший “好的”；затем “后来”和 за те́м “在那以后”；потому́ “因此”和 по то́му “沿着那个，按照那个”；但 изпа́ли “从远处”和 из па́ли “从远处”）。但是，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指出，在现代蒙古书面语的正字法规则中，对这种可能性的利用并不经常如此，也不全都一样。

译自《语言学问题》1978年，第1期

⑤ 俄语里没有那种词汇上明显相反的成对实词，看来这有利于证明该语言没有重读元音和非重读元音的音位对立这一意见。诚然，可以在俄语里见到那种带有重读元音和非重读元音而又明显相反的成对单音节词，但是，在这些词中很容易就看出各种不同水平的单位：一方面是虚词（连接词、前置词、小品词和感叹词），另一方面是实词（几乎永远都是外来词），但不是由两个实词组成的成对词。例如，俄语可以说：（Не доктор）ли ли́, （катаясь на лодке）по По́, （вспоминал стихи на языках байхуа）ий。书面语的体词化（Его）“но”（нас смущает）这种类型是特殊现象。

伊朗的突厥语

杰尔哈德·多费尔 著

魏萃一、魏喜玲 译

迄今为止，在各个操突厥语的地区中，人们对伊朗了解最少。至于伊朗人民中操突厥语的各种方言的情况，更是至今很少为人所知。看来，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政治环境造成的。伊朗过去处于突厥王朝（包括突厥军队）的统治下达一千年左右，因此显然产生了一种恶感，这就使得伊朗极少关心重视有关突厥语言及其文化的出版事务，甚至可以说无人过问。可以设想到，这种状况曾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阿塞拜疆独立运动（应当说这一运动获得了外界的广泛支持）和卡什凯人的连续不断的部落战争而日趋严重了。但是，在全国各地逐渐开花结果的自由化运动的影响之下（如：学校和医院的开办、公路的铺设、土地改革等等），了解伊朗突厥语的可能性开始逐渐增加了。由此使人看到，伊朗不单是人们最不了解的突厥语地区，而且是对人们最有吸引力的突厥语地区了，因为在一部分地区里，还保存着具有极特殊的古老特征的各种突厥语方言，然而这方面的情况还远不是一清二楚的。许多情况仅可能是估计而已。我们掌握的只是在许多方面仍属于模糊不清的草图和初步设想。但是在将来，这里必将会给我们献出丰美的礼物。

到目前为止，伊朗发现了四种突厥语言（也指方言组）。对此，我想简单地提供一些情况。

（一）阿塞拜疆突厥语（阿塞语）。分布情况请参考《突厥语文学基础》一卷（philologiae Turcicae Fundamenta I 1959）中的地图。操这种语言的几百万人主要居住在该国西北地区，而大不里士市则是该语言区里最重要的城市。在伊朗的突厥语里，阿塞拜疆语是最早被人们了解的语言，欧洲人曾在出版物中对这种语言作过相当多的介绍（参阅上述书中281页及其后的书目）。而在伊朗，关于伊朗的阿塞拜疆语，长期以来却仅有少量的语法出版，这里，我只想介绍其中最优秀的著作：费尔扎内的《阿塞拜疆语法源流》（M. A. Ferzane, Mebaniyi desturi zebani Azerbaycan, Tebriz, 回历1334）艾金曾在奥斯曼语课本（一）土耳其语法（Muhaarem Ergin, Osmanlıca derleri I, Türk Dil Bilgisi, İstanbul 1958）部分中举这本语法作为范例。

这种语言与其他语言相比，虽已有所介绍，但是研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在此提及。有关的出版物情况，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朗出版的有关阿塞拜疆突厥语的语言学书刊仅有二十来种。（有关详情我将在《伊朗阿尔泰学》Irano-Altaica,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I 中发表）。然而，与此同时，在苏联出版的有关苏联阿塞拜疆突厥语的出版物则达一千种。尤为重要的是，对众多的阿塞拜疆突厥方言土语仍然研究极少，这里有一个例子：在里海的东南岸的格路加赫、合什提克地区，有一种阿塞拜疆方言（在上述 Fundamenta 的地图中并未指出），在该方言里存在着 $\bar{u} > u$, $\bar{o} > \bar{a}$ 的变化。例如在这个方言里有 uq “三”（土耳其 üç），yuz “一百”（土耳其 yüz），därt “四”

(土耳其 dörť), gāz “眼” (土耳其 göz)。对于伊朗的阿塞拜疆方言的研究, 势将比阿那托利亚土耳其口语的研究展示出更为罕见的光彩夺目的景象。

(二) 艾纳鲁语。(三) 卡什凯语。这些语言与阿塞拜疆突厥语十分相近, 也可称之为阿塞拜疆突厥语的方言。说这些话的人在设拉子城的东南(艾纳鲁人)和西北(卡什凯人), 有关的出版物可以参考 Fundamenta 281页。孟杰斯(K·H·Menges)曾积累了许多有关该语言的资料, 但至今尚未见出版。按照他的意见(与许多其他突厥学家相反)艾纳鲁语和卡什凯语不是阿塞拜疆突厥方言, 按它的许多特点看来, 它与土耳其语相近似的程度大大超过了与阿塞拜疆语的近似程度。关于卡什凯语的资料我曾在1968年从我的学生那收集了一些(见下面第十项), 所有这些应尽可能在短期内出版。

(四) 土库曼语。按照前述 Fundamenta 地图所示, 操这种语言的人居住在苏联土库曼共和国以南(自边沿的戈尔干起), 以及里海的东南岸直到阿富汗边境的宽广地带。有些土库曼人则居住在阿富汗境内。(不属这种情况的可参考下述第十一项)过去对伊朗的土库曼语介绍得很少, 与苏联土库曼语情况不同。有关这种语言的各时期的许多资料无疑将待出版, 相应的科学研究也正在进行之中。〔可参见玉素甫阿兹孟(Yusuf Azmun)的《论土库曼民间文学》, 载于热合买提、阿拉提, 土耳其文化研究所刊物 19, I, A, 2期, 安卡拉 1966〕但是这些研究一般说还很不足。

在伊朗, 迄今为止, 可以说对“人们所知的”以上四种语言实际上研究得很少, 它们的方言有的或多或少地被介绍过一些, 有的则完全无人知晓。下面我想谈一谈在伊朗至今还没有人介绍过的几种突厥语言。由于对这些语言过去一直没有作过确切的调查记录, 因此我只能作一个比较含糊的估计, 将其分为以下五种语言。

(五) K·H 孟杰斯在《伊朗的突厥方言研究(波斯旅行的初步报告)》(载于 Orines 东方学报 1951年第4期)一文中曾报导, 在克尔曼省的南部和西南部有操塞尔柱(Saljuk)语的居民, 这是伊朗东邻相当遥远的地区的一种突厥语言。可惜孟杰斯没有机会调查塞尔柱语。

(六) 根据孟杰斯著作所述, 在俾路支和米克然, 即伊朗的整个东南部也有突厥语居民, 但是甚至对这里的突厥部落的名称还弄不清楚, 因此他们是否确实存在很可疑。

(七)、(八) 基摩尼兹(László Szimonisz, Bloomington) 于1965年在伊朗南部发现的语言。据他的一封信看来, 在德黑兰之南有说察合台语(东突厥语)和钦察(克普恰克)语的村落。我将他本人自伊斯坦布尔寄给我的这封信的重要部分摘录如下:

“1965年7月28日到8月中旬, 我曾去伊朗南方, 到过伊斯法罕和设拉子附近。关于伊朗南部的突厥人我什么都没有写过……我手头本来有极少一点材料, 遗憾的是连这一点也没有带来, 留在美国了。我对一些词语进行了研究, 并且发现它和西部(钦察)突厥语有很相近之处。路上认识的一个人向我提到在热扎下合市附近(距德黑兰南部90公里处通往伊斯法罕的路上)发现有两个村落, 其中一个操东部突厥语, 另一个操西部突厥语。向我介绍情况的人说他自己曾在撒马儿罕附近住过, 能讲察合台语。而现在, 这种使用着的活语言却与鄂尔浑语^①在系统上很近似。”

直到现在, 人们还不知道在伊朗(它曾保存了古代突厥语的表层)已发现了一种钦察语和一种维吾尔语方言。令人遗憾的是, 至今没能进行认真的有结论的研究。1968年我的学生曾去寻找上述村庄, 但没有找到。

^① 译者注: 指在蒙古草原鄂尔浑河流域发现的古代突厥碑铭语文, 大多代表公元八世纪后突厥汗国时期的语言。

(九) 据胡·热孜马拉 (Huseyn-Ali Rezmar) 在《伊朗地名词典》(德黑兰, 回历 1327年, 当时其它卷尚在研究中) 所述, 在伊朗的东北霍腊散地区有许多讲贝尔贝里 (Berberi) 语的居民村落。格廷根大学伊朗教研室讲师帕·拉加比 (Parviz Radjabi) 曾绘制过一张详细的地图, 特别重点指明了霍腊散地区的语言分布状况, 即本文第(四)和第(十一)项里所说明的语言。这份地图将要出版。据拉加比先生说, 贝尔贝里话只是一种突厥方言, 但是他也并没有十分肯定这一点, 因而首先还需要做更详细的调查研究。而舒尔曼在《阿富汗的蒙古人》(H·F·Schurman, The Mongols of Afganistan Gravenhage 1962) 一书的 114 页中则说贝尔贝里人属于哈扎拉 (Hazara) 族, 是蒙古型面貌的塔吉克人, 看来这个问题还没弄清楚 (关于这一点, 泰兹江也曾经提及)。

上面已对至今尚不清楚和从未研究过的几种伊朗突厥语作了介绍, 以下我想再对人们不了解但近来做过全面调查并有相当资料的两种突厥语作一番介绍。

(十) 首先介绍哈拉吉 (Halaç) 语。说这种话的人住在距德黑兰西南二百公里的地方。1906年和1917年米诺尔斯基 (Minorsky) 曾提到过这种语言, 1940年米诺尔斯基发表了《哈拉吉的突厥方言》一文 (载于 BSOAS 10:2, 417—437), 当年伊朗学者木加德旦木随后发表了一份词汇集 (M·Mugaddem: Guyişha-yi vefs ve Aştiyan ve Tefreç, Iran-kude 11, 德黑兰, 回历 1318)。自此以后, 对这种特殊的语言就没有什么介绍了 (孟杰斯在前面提到过的著作的 278—279 页中曾说哈拉吉语属阿塞拜疆突厥语)。本文作者曾证实哈拉吉话 (处较边远地区的) 不仅不是阿塞拜疆的一种方言, 而且也不是一种特殊的突厥语言, 而是一个特殊的突厥语组, 这一点看来是合理的 (参见《波斯中部的古代突厥语哈拉吉语》, 载于 ZDMG 118, 1968 79—112)。我们可以把诸突厥语分为七组:

- (1) 楚瓦什语;
- (2) 西南突厥语或乌古斯语 (土耳其语等);
- (3) 西北突厥语或钦察语 (喀山、鞑靼语等);
- (4) 东南突厥语或维吾尔语 (乌孜别克语等);
- (5) 东北突厥语或南西伯利亚突厥语 (图瓦语等);
- (6) 雅库特语;
- (7) 哈拉吉语。

在这些语组之中, 哈拉吉语是最小的语组 (仅有四十六个村落大约两万人说这种话), 但是它和楚瓦什语一样是极重要的语组, 因为它保存着很古老的特征。在这个语言里不只保留有古代突厥语里的 -d-, 而且还保留着突厥母语的 h- (<f- <p-)。例如 hadak “脚” (= 楚瓦什语的 ura, 土耳其语、喀山鞑靼语、乌孜别克语的 ayak, 图瓦语的 adax, 雅库特语的 atax)。这种词首保留 h- 的现象也散见于其他一些突厥语中 [如阿塞拜疆语、现代维吾尔语: höl “潮湿”, 乌孜别克语: hol = 哈拉吉语: hi : el, hō : öl (两点表示长音, 一点表示半长音)], 只有在哈拉吉语中的第一音节有开元音的一些词里才系统地保存着起首的 h- 音 (如: 古代突厥语: a : t “名字”, at “马”, 这个词在许多现代突厥语里开头的音变得相同了, 如阿塞拜疆语: ad, at, 只有哈拉吉语: a : at, hat)。在突厥语族中, 哈拉吉语是唯一保留有突厥母语的短元音、长元音和复合长元音三种对立元音形式的突厥语 (如 a, a : , a : a)。由此看来, 马合木德·喀什噶尔^①所说的长音, 以及土库曼语 (还

^① 译者注: 指十一世纪这位学者的名著《突厥语词典》。

有雅库特语)有与之相对的短音等这些所谓的“特殊”现象,现在可以真相大白了。这里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小小的图表:

(以元音 a 为例:)

土耳其语	土库曼语	马氏著作中	哈拉吉语
at	at	a:t	hat (马)
baş	baş	ba:ş	ba:ş (头)
ad	a:t	a:t	a:at (名字)

(以元音 o 为例:)

土耳其语	土库曼语	马氏著作中	哈拉吉语
tok	dok	tok	tox (饱)
kol	gol	ko:l	guol~go:l (手)
od(ateş)	o:t	o:t	hu:ot (火)

还应当指出,元音在非重读时和说话速度快的情况下可以缩短。

关于这种语言的研究工作我想提供下列情况:赛米赫·泰兹江曾以我的名义进行过一次调查旅行,他是我早期的学生。1968年3月我的三个学生(乌夫拉姆·合赤,哈特维格·什哈特和赛米赫·泰兹江)一起在我倡导下作了这次调查,当时我因早已确定在美国任客座教授,未能参加这次旅行。我的学生在这次旅行中录制了九盒录音带,其中大多是哈拉吉语,还有一部分卡什凯语的资料。

就在当年,德国东方学报(ZDMG)发表了我那篇上文提到过的文章,该文由于写于1967年,没能看到我的学生所搜集的资料,所以主要依据米诺尔斯基和木加德旦木曾做的工作。此外,关于哈拉吉语,我还写过一些文章,将由 Current Trends 出版。在1968年乌尔兹堡举行的德国东方学家会议上,我曾就哈拉吉语作过一次讲演,这次讲演稿将作为会议文件出版。讲演中肯定了在哈拉吉地区的首次旅行中所得材料的价值。

1969年3月,我的学生拉加比和泰兹江(二人均曾参加旅行)一起作了第二次旅行调查,这次旅行期间所得资料远较第一次为多。

1968年第一次旅行所得哈拉吉语的资料已经作为第一卷递交乌拉尔——阿尔泰学会(Blooming ton)准备出版。在这本书里已收入一些原文,并论述了哈拉吉语在语言史上的重要性。今后将出版的各卷包括以下内容:

I 卷 其余的原文

II 卷 全部语法

III 卷 哈拉吉地区的语言地图

为了概略地说明这种突厥语的特点,我在这里公布来自哈尔拉布(xarab)村里的一段原文,这首诗是木·阿拉布尔(Müseyyib Arabgul)先生在1968年写的,它是哈拉吉文学的最早标志(哈拉吉人没有自己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没有创作文学)!应当说明的是,下文只用了简化的转写符号(因而我没有指出开口音和闭口音的区别),对于相当杂乱的哈拉吉语音的情况可参见哈拉吉资料I卷,a音发音中经常因唇化,g的发音则象ağ“网”(指土耳其语——译者注)之中的ğ,而不象dügün“典礼”之中的ğ。

Nahar başuy tırkı ye:l häpsä'r-ürti,

Yüzüyü bi:ha,çuk bi: baktä'r-rtiä,